

江西文史

2011 年第 1 辑（总第 4 辑）

许怀林 主编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文史

JIANGXI

WENSHI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2011年第1辑(总第4辑)

编辑委员会

主任：谢茹

副主任：谭晓林 李少恒

委员：廖宇阳 赵子循 许怀林 俞兆鹏 龚国光
宗九奇 陈一文 徐林义 平德威 贺敏
万军伟 李其杰 沈艺

编辑部

主编：许怀林

副主编：龚国光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文史. 第4辑/许怀林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10-04869-5

I. ①江… II. ①许… III. ①文史资料-江西省 IV. ①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246 号

书名:江西文史(第四辑)

责任编辑:胡滨

封面设计:章雷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6898565

发行部电话:6898801(发行部)

邮政编码: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210-04869-5

赣版权登字—01—2011—18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8.00 元

承印厂: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刷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西文史
——
目录

1 辛亥革命在江西的胜利——兼及“大汉铜币”承载的时代信息 许怀林

11	江西“溪(溪)狗”考辨	邵 鸿
19	江西两个吴城的文化思考	王水根
23	中国古代社会实践重农抑商的变异	沈星棣
27	工塘之战	吴定安
30	谈史学论文的撰写	俞兆鹏

36	赣湘文化的老表情结	许怀林
44	湘赣戏剧文化的亲缘与互动	龚国光

51 江西学术文化的传承与现状对策 胡迎建

56	20 世纪上半叶的江西公路建设与地方经济	游海华	胡卫星
61	蒋经国任职赣南的历史考察		方世藻
69	人人有书读——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教育建设	方世藻	赵利文
75	路易·艾利与东南工会组织		迟宪平

78	小金县四碑刻	宗九奇
80	中华文化地标——江南名楼滕王阁	宗九奇
82	赣南的风水塔与风水信仰	万幼楠

90	唐代庐山咏道诗论析	陈金凤	简世根
98	华丽转身与历史机遇——对中国瓷画创作的思考		陈一文
103	明清时代江西曲艺概略		万 叶
109	杏花春雨		涂友泉

馆员风采

111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黄沙始见金——记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山水画家汤教勉	龚国光
-----	--------------------------------------	-----

人物记述

116	“样式雷”世家的研究三题	吴百衡
122	得失俱忘笔意雄——忆胡献雅教授	孙 宪
126	我的“文革”经历和认识	李金水

文章转载

128	辛卯(2011)清明恭祭民族英雄文天祥文
-----	----------------------

书画长廊

129	书画作品 13 幅	
	浩气长存(国画)	平德威
	相知惟明月(国画)	廖维章
	溪声无尽(国画)	方学晓
	松鹤图(国画)	陈慧荪
	长青(国画)	涂友泉
	书法(隶书)	徐林义
	新居(国画)	黄昆桂
	山居图(国画)	汤教勉
	秋思图(国画)	罗文华
	伟峰生晓烟(国画)	杨 豹
	玉堂盛开富贵花(国画)	王靖忠
	词、书法(行草)	赖淮靖
	初春红土地(水彩画)	杜玉华

征稿启事

137	《江西文史》稿约
18	封面照片说明

辛亥革命在江西的胜利

——兼及“大汉铜币”承载的时代信息

文◎许怀林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一个新时代,我们还将朝着它的方向继续前进。江西的维新、革命志士,发扬“文节俱高”的品德,积极关注“国事民隐”,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放开眼界,创办多种农工实业;吸纳西学,思考民富国强的有效途径。陈炽连续发表的《庸书》《续富国策》,是当时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的论著。江西革命志士组织社团,宣传政治革命,发动萍浏醴武装暴动,开启辛亥革命的前奏。在预定武昌、九江、南昌三地同时起义计划破产之后,积极响应武昌首义,推翻帝制。九江光复,妥善争取海军归顺,支援武昌革命势力;真诚出手援助安徽,使其局面趋于稳定。南昌起义胜利,“龙旗变为五族共和之五色旗”,发展革命主张。随即铸造了“大汉铜币”,这是一种独创之举,它记录下特定时代的社会变革信息,是忠诚于辛亥革命的证明,其十八星图案纹饰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之印记。该铜币的历史资料意义,远远超过其本身的钱币价值。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昂首阔步前进。辛亥革命的功绩,最突出的是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仿效西方社会,倡导“三民主义”,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回顾百年,为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庆贺,为国家昌盛前途光明而欣慰,衷心地向先烈们鞠躬致敬;正视现实,深感前程远大而重任在肩,许多使命有待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烈士的热血已经铸成了丰碑,鼓舞我们奋勇前行;先行者留下的精神遗产,启迪我们坚定不移。重温历史,光大传统,开拓事业,与时俱进,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贡献力量。

江西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扬文化优良传统,把关注“国事民隐”的自觉热情,“文节俱高”的人品素

质,转变为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踊跃奋起,前仆后继,变革维新,表现出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善于应变的政治建设才干。他们参与组织强学会、同盟会、共进会等社团,酝酿并发动武装起义。在辛亥起义之前,本有武昌、九江、萍乡三地联络并举的战略设计,但因事机不密,临时应变,武昌首义,九江、南昌随后响应,而其积极性之高,牺牲精神之强,影响之大,仍然是前后辉映。江西光复之后,即时铸造“大汉铜币”,留下伟大变革时代独有的钱币实物,真实地记录了新旧更替的社会印记,给子孙后世留下了许多思考话题。它见证了江西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是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产物,其文物价值超越了区域界限,具有全局性的参考意义。“大汉铜币”具有珍贵的纪念意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一、维新思潮在江西涌起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在中国肆意侵略劫掠,空前的民族灾难,刺激高压下的同胞觉醒,为救亡图存而不懈抗争。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宜黄黄爵滋就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他以《塞漏卮以培国本》奏疏,促成道光皇帝决心禁烟,拉开了抗击英国侵略的序幕。此后几十年间,列强的侵略加紧,清朝的腐朽本质更加败露,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断加深。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诱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进一步激发人们转变观念,寻求维新变革出路。江西士绅竞相讲习时务,倡导维新,且有身体力行之效。义宁(今修水)陈三立,感慨“国亡久矣”,抨击士大夫中“冥然无知”的守旧状态,断然“令子弟改业西学”。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团结黄遵宪、江标、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宣传维新变法,整肃吏治,开矿设厂,兴学育才,讲习自治,编练新军,推行资本主义新政,陈三立全力襄助其事,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江西文史
——
Jiangxi Wenshi

萍乡文廷式,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的官职,在甲午战败之后不久写《读〈海国图志〉书后》,总结数十年治洋务却一战法兰西而败,再战日本又大败的教训,指出原因在于没有议院制度与办学校培育人才。他说:西方富强的根本并非枪炮舟车,而在于“立议院以通上下之情,兴学校以作天下之才”,秦汉以来的制度必将大变,立议院、兴学校、达民情、教人才,为“立国之大本”。他建议江西官员在书院中分设政事、格致、艺学(即工科)、文学、语言、陆军、海军等专科,培养“文与武合,士与商通”的人才;创办机器矿务局,发展经济,改变贫困。他自己在萍乡开办“广泰福”商行,使用机器采煤、炼焦,为其他商家仿效。文廷式在北京参与创办维新的政治性组织——强学书局,在上海与陈三立、邹凌瀚等合作,创办《时务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

瑞金陈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以敏锐的洞察力,于1894年写出《庸书》百篇,提出发展工商业,反对列强把持海关。认为议院制有“可否从违,付诸公论”的规矩,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①。主张兴办新式学堂,开设“同文(英文)、方言(中文)、水师、武备各馆”,“并请洋师,兼攻西学”,培养体用兼备的新人,是“根本之要图,治平之首务”^②。1896年又写出《续富国策》60篇,其中农书16篇,矿书12篇,工书14篇,商书18篇,自叙说是“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期待“他日富甲环瀛”的应是中国人。^③陈炽不仅论说,而且见诸行动,在担任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期间,为帝党起草12条新政纲要;捐助资金,刊行《万国公报》;突破不准结社的专制禁令,带头组织“强学会”,任提调(会长),并担任京师强学书局的总董。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议论时政,呼吁救亡,鼓荡维新思潮。

在维新思潮带动下,江西维新派大胆发行维新报刊,《万国公报》《时务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知新报》《农学报》《算学报》等,在江西都有较大影响。《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后,南昌邹凌瀚、邹凌沅兄弟以其家邹公馆(在今南昌系马桩)、九江福康轮船公司作代销处,销售数量很大,据统计1897年江西每期定购约450份,位居各省前列,与北京、上海、广州不相上下。^④

江西本地出版的报刊,有《时务菁华报》,1898年萍乡县顾燮光主办,登载中外政事、经济文萃、实学汇要等。

《江西白话报》,1903年江西留日学生张世膺创办于东京,一年后改名《新白话》。该报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罪行,痛斥清朝腐败,倡导反满革命。在南昌设有总代派所,赣州、九江、吉安、萍乡设分代派所,对省内的影响比较大。

《自治日报》,1906年江西革命党人在南昌创办,吴宗慈任主编。

《江西》杂志,1908年江西同盟会员汤增璧、文群创办于东京,刊文批判清朝统治,呼吁国人负起武装救亡之责任:“今日之世界,铁血之世界,而亦武装和平之世界”,“欲保和平,必具武装,励一国之铁血以为铁血,而国强于全球;壮一国之武装为武装,而国安于磐石”^⑤。宣传反对清朝统治,提倡铁血武装斗争,为辛亥革命在江西的胜利作了舆论准备。

省内人士设立的书局有邵莲士的“时务书局”、邹凌瀚兄弟的“致知书局”;成立的会社有“废时文会”、“奋志学社”、“励志学会”、“同心会”、“医学会”、“讲学茶会”等,他们不时聚会,评议维新变法,有利于破除封建守旧观念对人们的束缚。

新式学堂也在开办。1901年12月,江西巡抚李兴锐奏准合并省城书院,建立江西大学堂,选聘教习,分斋教课。翌年正月,在省城设立工艺院,内分粗工、细工、学工三厂,招收“无业游民及犯轻罪之人,雇派工师,教以工艺”。光绪帝对此大加赞赏:“收养游民,教以工艺,最为良法美意,着即认真办理。”^⑥1904年更名江西高等学堂。

1906年,江西铁路公司总办李有棻在九江创办“江西全省铁路学堂”,培养工程、运输人才100名,及时解决了缺乏技术职工的困难。^⑦与此同时,江西商务总会定下章程,把开通商智列入四大任务之中,为此开办了“商徒启智学校”。其他学堂还有江西医学堂、江西实业学堂、江西方言学堂、江西初级师范学堂、江西法政学堂、江西女子蚕桑学堂、江西女子师范学堂等。

这个时期开办的私立学校,有南昌熊氏家族的英文学塾,燕善达的私立初级小学,周六平的私立大

同学堂,江峰青、李家德等人开办的私立登瀛学堂等。

二、新式企业的创办

在国家维新大潮的推动下,人们更新观念,吸取新知识,以更开阔的视野,创办实业。

江西地方政府经过几年酝酿,于1904年设立农工商矿总局,鼓励民间办工厂,开矿山,振兴商业,同时派黄大壩赴日本考察,并随带10名学生,分送日本各学堂预习,以备振兴实业之用。1908年增设“劝业道”,以傅春官为道尹,督办地方实业。各府县之中,有30余个单位设立了农工商务局等机构,因地制宜辅助本地农牧商矿事业。

农业中的新政最快。1896年3月,蔡金台、熊方燧、蓝钰等人在高安县创办蚕桑学堂,这是清末中国第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以研求种桑养蚕之法,培养学生,推广桑蚕业发展。不久,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在南昌创办蚕桑局,购买浙江湖州桑苗十数万株,免费分发绅民栽种,又刊刻《蚕桑辑要全书》《种桑秧简便法》《种桑事宜》《养蚕良法》等科技书,颁发各地,飭令督导举行。大约同时,奉新县筹款购买桑苗2万株,在荒地上栽种。赣南设立了“赣州蚕桑总局”,有乡绅在赣州南郊种桑13万株。1905年后,南昌、余干、奉新、高安诸县都设立了不同名号的农牧垦殖公司,经营茶、桐、蔗、棉、蓝靛等经济作物,运往外地销售,已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

航运业搞得最活。在长江流域诸省中,江西试办内港轮运时间比较早,也很活跃。江西士绅针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在开办轮船航运呈文中指出:《马关条约》“准令(列强)机器制造土货,通行各省,则内河轮船,此时我不争先创办,日后彼将次第举行,待漏卮之日多,恐补牢而无及……待彼之轮船既行,则我之商务益棘矣”^⑧。1896年,邹凌瀚等人开办九江“福康商轮公司”,购置6艘小火轮,分驻九江、鄱阳、南昌,每逢二、五、八日开航。随后九江新增“和济小轮公司”、“顺昌协记小轮船局”,鄱阳成立“商务内河轮船公司”。至1900年,已有十余艘商轮航行在赣江中下游、鄱阳湖航线上。1902年10月,官商合资的“内河商轮公局”在南昌成立,随后又成立江西官轮总局。发展至1911年,九江海关统

计江西内河的本省籍轮船,共有33艘。民营轮船航运的兴起,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江西航运的垄断,为江西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建筑铁路。陈炽在《续富国策》中指出:“欲考天下万国之贫富,以铁路之多寡定之矣”,在中国“铁路为至急至要之图”,必须排除干扰,坚决实施,而铁路干线应该官办。^⑨清末江西实际建筑的铁路有株萍线、南浔线两条。汉冶萍公司为解决煤炭运输困难,1899年修筑萍乡至安源7公里铁路,然后延伸至湖南醴陵、株洲,于1905年建成,全长90公里。1904年,江西设立“江西铁路公司”,李有棻为总办。1906年筹建南浔铁路,1916年竣工通车,全长128.35公里。这两条铁路让江西人眼界大开,更新观念,推动了近代工矿业的发展。

在制造业中,制瓷业居主要。1903年创办景德镇瓷器公司,官府拨银10万两建设窑厂,专造洋式瓷器。1907年改组为官商合办,更名“江西瓷业公司”,使用机器烧造外销瓷器。该公司总厂在景德镇,在鄱阳城内设分厂,于九江、汉口、上海设发行所,统一管理生产和销售,避免行商的中间盘剥。由于注意选料,精心施工,烧出的瓷器“几与前清之御窑媲美”。鄱阳分厂附设了陶业学校,培训技术工人,传授机械制瓷,煤窑烧瓷技术,以便取代手工操作和柴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辛亥革命后,鄱阳分厂停办,陶业学校与瓷业公司分离,改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后更名江西省立乙种工业学校,归省管辖。该校在培养陶瓷技术人才,促进陶瓷技术发展中作出了贡献。1904年,景德镇开办一家商办“宝源滇料公司”,采购云南瓷土,供镇上烧制青花瓷需用。萍乡黎景淑,于1904年筹资创立商办萍乡瓷业公司。次年,该公司的文乃麟、廖凤喈另外集股设立瓷业有限公司,在上埠镇开窑烧瓷。

采矿业主要是采煤,以萍乡煤矿的贡献最大。1896年,文廷式等人集资成立广泰福商号,在萍乡采煤、炼焦,有7厂18井,炼焦炉50座,自购小轮船运销,专供汉阳铁厂需用。1898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为保证焦炭供应,正式开办萍乡煤矿,10年后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为“汉冶萍钢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萍乡煤矿采用机器开采、运输、洗煤、

江西文史
——
Jiangxi Wenshi

炼焦,开始时年产1万吨,炼焦2.9万吨,以后逐年增加,至1911年达到采煤61万余吨,炼焦17万吨。萍乡煤矿是全国最大的煤矿之一,为汉冶萍公司的重要支柱,对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此外,还有铅山县同孚煤矿公司,余干县呈山煤矿、枫港维新煤矿、三图博厚公司,乐平县永乐(煤矿)公司、美利(煤矿)公司,新建县徐塘煤矿,上饶烂泥塘煤矿等。铁矿,主要是九江城门山铁矿,年产量约600多万吨,供应汉阳铁厂和省内各实业公司。1906年,永新创办保富铁矿有限公司,有铁炉4座,每年出铁100余万斤。

维新思潮的涌起,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扫清思想障碍。近代企业的兴办,初步奠定了社会变革必须的经济基础。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反对,维新派被加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或杀或贬,全都被镇压了。江西文廷式也在通缉搜捕之列,被迫逃亡日本避祸。陈宝箴以“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陈炽为变法失败、同志蒙冤而痛心疾首,郁郁不得志,酒前灯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痴若狂。自上而下的改良失败,证明清朝统治积弊深重,无可救药。维新变法的思想觉悟,实业建设的初步成果,汇聚成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然而必须抛弃改良幻想,发动政治革命,掀翻专制王朝,中国社会才能有大进步,人民才能获得新生。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江西各地出现不少会党组织,不断有民众的暴动斗争,掀起响应辛亥革命浪潮。

三、响应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1911)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义。九江于九月初二日、南昌于初十日先后响应独立,全省各府县靡然从风,不及一月,全省光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江西九江、南昌与武昌的先后起义,是客观形势突变造成的。当年九江光复支队在报告九江光复经过的文件中叙说了原委:

“广州之役失败后,各同志每思大举,无机可乘。七月间,有赵声部下之杨同志来浔,运动新军第五十三标排长何燮桂、顾英、黄锦龙、丁仁杰、胡爱德,炮台之炮目陈廷训等,密议拟于八月十五夜,与南昌之工程队及武昌发难。嗣接南昌韦兆熊同志密函,略

谓清吏防范甚严,宜多派同志联络,始可达目的。……未几,闻武昌机关破获之耗,乃不敢轻动,决候南昌及武昌有发难消息再动。十九日,武昌同志突发难,兆熊由南昌密函催询省、浔何日同响应。事为赣抚冯汝骥所闻,……(在浔同志)暂为隐忍。至九月初一日,突闻湖南已响应武昌起义,于是临时密议,定于初二日晚九时发难,即派人通告省方工程队等诸同志,请速相机响应并协助。”^⑩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保存的这份档案,是当事人报告当时之事,说明预定的武昌、九江、南昌三地同时起义计划破产,被迫先后举事的原因,是可信的史实,有助于全面了解革命党人对起义的急迫情绪,而组织工作不严密,故而仓卒而起的内底。从同盟会成立之后准备武装起义的全过程来看,江西革命党人承担的任务不轻,辛亥革命的历史是从萍浏醴暴动算起。这个情节在《辛亥革命首义记》《中国国民党党史》等相关文献中都有反映,如前者说萍浏醴起义失败,“党羽潜来鄂境,(鄂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派军警围湖北日知会,捕获刘敬庵……等九人,分押于监狱。时狱官江西人熊家骥,颇加庇护。”点出了萍浏醴起义与武昌起义之间的“火种”传递关系。党史中的《萍浏醴之役》则说:丙午年(1906)“秋间,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回自日本,在湖南醴陵、浏阳等处鼓吹革命,其会党首领李经其、龚春台、萧克昌、姜守旦、王胜等闻之,志益坚。适长江旱灾,米珠薪桂,人心浮动,乃乘机联络,拟于十二月起事。”这就表明了萍浏醴起义与同盟会的紧密联系。所以,我们不妨把萍浏醴起义看作辛亥革命的前奏,考察辛亥革命在江西的胜利必须从萍浏醴起义说起。

1. 萍乡起义——辛亥革命的前奏

萍乡起义,即萍浏醴起义,这次斗争的主战场在萍乡,安源煤矿工人是起义的中坚力量,暴动提出的奋斗目标已经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

外国列强的侵略掠夺,加上清朝统治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新昌(今江西宜丰县)胡思敬奏报说:“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农民负担沉重,“漕粮、地丁、耗羨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

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潜逃者比比也。”^⑪江西府县官员大批庸劣贪腐,剥削残酷,“州县征收丁漕,往复折扣,抑勒病民”,激起民众强烈反抗。1906年,吉安府数千农民反对催征旧欠而暴动,九江府瑞昌县民众捣毁厘税分卡,鸣锣聚众,抗击官军镇压……

近代中国兴起的秘密会社,主要有白莲教和天地会两大系统,江西是天地会系统内的哥老会的一个大根据地,而且与湖广、江浙的联系紧密。他们以“反清复明”、“反清灭洋”相号召,与革命党人比较接近。江西地方官向朝廷奏报说:“江西会党甚多,伏莽遍地”,“江西、湖南交界地方,民情浮动,匪党声势猖獗,于大局极有关系”。^⑫当时,同盟会员重视这种社会条件,主动和会党成员建立联系。

光绪三十二年(1906),萍乡同盟会会员蔡绍南在浏阳、醴陵一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和洪江会首领醴陵龚春台、李经其,浏阳姜守旦,安源萧克昌等都有密切联系,发展群众入会,“萍浏醴三县以拳术善长者,莫不入其彀中。酝酿数月之久,人皆不敢议其非”。^⑬几个月间,洪江会成员已经扩展到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诸县,安源煤矿数千名工人都参加了洪江会。龚春台等秘密制造火药、军械,派人前往上海、广州联络革命组织,并转往日本东京,会见孙中山,请求支援枪械等。计划在农历十二月起事,分兵三路,一路据浏阳以窥长沙;一路占据萍乡安源路矿,以为根据地;一路由万载进攻瑞州(高安)、南昌,进取江南。因事机不密,被浏阳知县探知,发兵缉捕,李经其落水溺死,萧克昌被诱杀。龚春台、姜守旦遂仓卒提前在十月十九、二十日几天起义于浏阳县之麻石、文家市、金刚头,萍乡之高家台、上栗市、桐木等处,攻占宜春县的慈化乡,焚毁黄圃巡检衙署。当年湖北、湖南、江西相邻地区“悉遭荒歉,萍乡安源矿工因受米贵减工之痛苦,遂首先发难,浏阳、醴陵各会党应之”。起义声势很盛,众至数万人。

起义者统称革命军,以头缠白布,手持白旗为号,衣服上写“革命军先锋”、“前营”、“后营”;旗书“革命军”、“洪福齐天”等字。在萍乡者以安源矿工

为中坚,在醴陵者以防营兵勇为中坚,在浏阳者悉数洪江会成员,以龚春台所统浏阳部队为主力。龚春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革命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铜鼓的会众响应起义,攻陷铜鼓城,烧了分防府和都司衙门。孙中山、黄兴闻讯,“由东京先后分遣同志入长江各省,运动军界响应。无如事机不密,多为汉奸所破坏”。由于革命军指挥者皆会党首领,缺乏军事学识,组织又很分散,只有土枪、土炮,或竹竿、菜刀,甚至赤手空拳,战斗力薄弱,很快被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四省5万清军围攻追杀,革命军英勇拒敌,相持月余,交战24次,死者千余人,最终失败。清朝官府在萍浏醴地面严厉“清乡”三个月,事情才算过去。

萍浏醴起义的地域甚广,“故党人牺牲者亦众”,产生的影响也很大,“长江上下游为之震动”。这次起义“声势之大,为从前革命诸役所无,而牺牲亦最为众多”。官府的电文称:“萍醴革党蔓延甚广,其志愿不小。所过之处并不骚扰,唯取军械、粮食及白布而已。所劫杀者皆系办团之绅董。”^⑭起义者在同盟会纲领的影响下,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目标。他们张贴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指出,推翻清朝以后,“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并认为此等幸福,“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⑮萍乡起义已经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它虽然失败,但是扩大了同盟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革命党人进一步到各地联络会党、新军,继续发动武装暴动,掀起斗争高潮。

2. 九江、南昌响应武昌起义,光复江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篇章。江西九江率先响应,南昌紧随其后,全省迅即光复,扩大了辛亥革命的战果。

江西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已十余年了。江西留学日本的青年,在陆军学校的有李烈钧、俞应麓、彭程万等,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参加“武学社”、“丈夫团”等组织,“皆以推翻满清统治为职志”。他们

江西文史
——
Jiangxi Wenshi

在省内相互联络,活动很多,据当事人蔡复灵说:

“庚子乱后,骤感激刺种族革命思想。于是,邓文翬、彭素民、熊公福、蔡复灵、周养浩、张维和、张惟圣、姜伯彰、萧家修等创结‘易知社’于南昌,又立‘我群社’于宜丰,巡防统领廖名缙则设‘兴中会分部’于吉安,互相联络进行。复灵与弟锐霆居宜丰,则与湖南之焦达峰、刘揆一等亦声气相通。”^⑩

南昌、宜丰、吉安三个点,实际上涵盖着江西的北半部地区。“易知社”成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以南昌张惟圣、峡江邓文翬为主,是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社员60多人,其中不少是武备学堂、陆军小学的师生。他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创办《新白话》《江西》等报刊,也代销《革命军》《警世钟》等外省的书报,通过这些新式读物,宣传革命,扩大影响。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江西籍留学生张世膺、陈荣恪、李烈钧三人参加了筹备工作。孙中山派黄格鸥、魏会英回江西组建同盟分会,易知社的张惟圣、邓文翬等大批社员都成了同盟会员,蔡复灵全家均加入同盟会。1906年江西同盟分会成立,会长黄格鸥,地点设在蔡复灵家(在南昌鸭子塘),其母刘大慈担任主持者。魏会英返回赣州,组建了赣州分部。不久,高安、宜丰、万载、铜鼓、峡江、清江、新淦、丰城、临川、宜黄、崇仁诸县,以及李家渡、樟树、棠阴等镇,均有同盟会分部的秘密组织。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萍乡也设立了同盟会分部。1908年,同盟会总部选派李烈钧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在江西等省新军中开展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

1906年,九江胡厚斋牧师仿照湖北日知会样式,设立九江“开化书报社”,附设平民学校,在绅商军学及海关各界人士中有很大影响,九江常关的不少职员都是该书报社的成员,林森(闽人)即是代表者。林森又与吴铁城、罗惺予、陈中瑞诸人,组织“浔阳阅书报社”,设在城内化善堂,输入革命书报,热血青年读后,无不感动奋发。同盟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同时,注意在驻九江新军53标中建立联系。

武昌起义前一天(农历八月十八日)正午,江西新建县人丁笏堂,正和孙武等人在宝善里14号配制炸药,有旁观者不小心把香烟灰掉落配药盆内,引起

爆炸,暴露了革命机关,文书、名册、符号、旗帜全部落入官府手中,丁笏堂当晚乘轮船避往九江。^⑪于是,武昌革命党人不得不紧急应变,于第二天(即十九日)发难。

武昌首义,九江人心震动。革命党人罗大伦、林森、吴照轩、罗惺予、蒋群等毫不迟疑,联合新军53标的标统马毓宝等人响应起义,于九月初二(公历10月23日)夜八时,城东岳师门外的金鸡坡炮台炮目陈廷训放炮3响,城内的新军发三枪响应,四路火起,爆发起义。起义者左袖缠白布,手举白旗,口号“同心协力”,焚烧了九江道官署,占据了九江府衙,九江道员保恒仓惶逃命,九江知府璞良拒不归顺,被杀(或说逃出)。坐镇九江的提法使张检,只身乘船逃回省城,其卫队40人全部归顺。起义者在招商局码头竖立中华民国大旗。同时派人通告省方工程队等诸同志,请速相机响应并协助。天亮后,军士沿街巡逻,劝商人照常营业开市,全城安堵。军学各界以及城中商店,均悬挂白旗,及欢庆民国的小红旗。起义军占领了湖口炮台、彭泽马当炮台以及九江上游田家镇炮台,^⑫控制了长江航道,汉口的清朝军舰接济中断。接着组建了“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马毓宝为都督兼军务部长,罗大伦政务部长,林森为政务副部长,蒋群任总参谋长,徐世法为驻浔炮台统领。稍后,总参谋长由李烈钧担任。九江军政分府发布了马毓宝签署的公告,文曰:

“大汉光复,万姓欢腾。义旗所指,首在安民。胡虏入关,各处屠城。我军宽大,不乱杀人。倘敢抵抗,有死无生。凡我同胞,戮力同心。解除束缚,再见光明。三呼万岁,革命成功。”

使用的军旗上,有“内九星,外九星”,即十八星图案。^⑬

所谓“大汉光复”,意即推翻了清朝统治,“胡虏入关,各处屠城”,是重翻老账,指270年前清朝入关时期,在江南滥杀平民,例如扬州被屠城之事。十八星图案,比喻内地18省联络反清。

九江起义胜利,极大地震动南昌。自从提法使张检狼狈逃回南昌,省城逐日风声鹤唳,人心惶恐。绅商学界许多人士每日到总商会聚议应付方法。革命党人不甘落后,在《江西民报》登载九江起义的文

件,报导消息。一般市民不知底细,“商家竞提存款,民间争兑现银,市面支空”。江西视学吴宗慈,早已参与谋划起义,起义前一日,他在主办的《自治日报》套红刊登题为《满城风雨近重阳》社论,明说“大清政府从此长辞矣”。文章中以人道主义为重,讽喻江西巡抚冯汝骥反正。这篇预示起义的社论对市民有很大的号召力。革命党人决定将驻在城外的马、炮、工、辎各营队编成光复军,在工程兵中组织越城队,命他们入城后与江西巡抚卫队中的革命党人配合,夺取卫兵武器,接应后续人员。另外派人争取警察,支援起义。九月初十(公历10月30日),同盟会员蔡公时和南昌各界联合,准备拥戴冯汝骥宣布独立,可是冯汝骥拒绝。蔡公时于是发动新军深夜起义,“光复军”顺利入城,城外的新军混成27协、城内的独立55标所辖两营半官兵跟着起义,占领了军装库。吴宗慈命张鲁璠、郭穆堂从《自治日报》社取洋油二箱,去烧了皇殿和巡抚衙门前的吹鼓亭,冯汝骥吓得躲进筷子巷一家店铺,然后乘船逃九江,吞服鸦片而死。其他文物官吏躲的躲,逃的逃,“龙旗变为五族共和之五色旗,脱离奴化束缚,而为共和民族矣”^⑩。全城兵不血刃,宣告起义胜利。

江西军政府成立,在城内葡萄架王鹿之先生家聚议长官人选,推举“军界现握权最重要”的新军混成27协统领吴介璋任都督,罗家衡任外交部长,邱冠芬为民政部长,胡绎任司法部长,李国梁任实业部长,龚士材任财政部长。^⑪吴介璋通电省内外,又发布檄文,令全省各府县遵守军政府命令,照常视事。十二日,赣州、吉安、南安三府光复。十三日,南康、瑞州二府光复。辛亥革命在江西取得了胜利,清朝在江西的封建统治最终结束。二十三日,吴介璋辞职,绅商各界公推“本省最重要革命要人”彭程万接任都督。一个多月后,彭辞职,公推马毓宝继任,派吴宗慈、贺尔翌前往九江迎接。省内各地会党充斥,社会不安,马毓宝无能为力,多方迁就会党,渐呈不可收拾之势。约两个月后,临时省议会决议请南京中央政府任命李烈钧(江西武宁县人)继任都督。民国元年(1912)3月,李烈钧由武汉回南昌就任都督。李主政江西一年多,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实施整顿,使社会面貌一新。1913年7月被推为讨

伐袁世凯总司令,开始“二次革命”战争,离开江西。

3. 江西光复对全局的贡献

江西是继湖南、陕西之后响应武昌起义,结束了清朝在江西的统治,对扩大辛亥革命影响,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妥善争取清朝海军,支援安徽两方面。

(1)九江为江西门户,长江通衢,上接武汉,下通沪宁,素为战略枢纽之地,附近的湖口、马当炮台,更属航道军事要塞。李烈钧接任总参谋长之后,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马当炮台。游弋在湖口、彭泽之间的清朝海军兵舰,水兵多是福建人,他与罗大侔、林森商议,由林森以同乡关系登上军舰,说以民族大义,使他们归顺,与革命党合作。革命党人控制了九江,将长江航线拦腰截断,断绝了长江下游海军对武汉清军的支援,解除了武昌起义者承受的军事威胁,革命声势为之大振。原驻汉口的舰艇,因缺乏米、煤、盐供应,有9艘退至九江,被阻截,林森、吴铁城、陈中瑞等登舰劝其与革命派合作,并负责筹发薪饷,诸舰艇宣布起义,加入了革命军。长江下游驶来的6艘舰艇,被马当炮台截获4艘,2艘逃回。这4艘军舰装载的军械弹药,补充了九江的革命军队。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指挥的舰艇有海筹、海容、海琛等16艘。

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战事激烈,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李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率舰西上,抵武昌,迅即部署海陆两军,控制武昌军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舆论认为:“革命军有舰队为助,据城固守,沿江岸防御线上下七十余里,经营甚固,清军终不得逞,未始非海军援助之力也。”^⑫

(2)九江光复,安徽大为紧张,清朝巡抚朱家宝见势不妙,伪称独立。九月下旬,安徽咨议局议长窆以珏等以地方糜烂为由,派人来浔,请予支援。李烈钧即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革命党人光复安庆。不料黄部到皖之后,军纪废弛,士兵因索饷而哗变,掠夺财物,箱笼山积,引发当地营兵及地方无赖均起劫掠,凡富绅及商店莫不被祸,城内秩序大乱。安徽要求派大员前往镇压,李烈钧遂率步兵一

江西文史——
Jiangxi Wenshi

营,兵舰两艘,于九月三十日赶赴安庆,邀革命党人胡万太、绅士陶寿民等商议调停,将黄焕章关押,处决为首肇事者,归还所掠夺财物,迅速安定了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由于武汉形势趋紧,李烈钧奉黎元洪之命驰援武昌,将安徽都督大印交付胡万太,率军西去,结束了在安徽的短暂使命。

四、“大汉铜币”的铸造

江西省光复之后,铸造了纪念革命胜利的钱币——“大汉铜币”。“大汉铜币”的铸造,在近代机制币铸造中具有典型性意义。

江西铸造的“大汉铜币”,直径2.8厘米,正面核心圆点上有阴文“赣”字。内圆珠圈中“大汉铜币”四字按上下、右左顺序排列。外圈上方书“江西省造”,下方为“当制钱十文”,中腰右边为“辛”字,左边为“亥”字。字体全部为楷书。背面核心圆珠圈上是太极图。由内而外,第一圈由9个小圆点排列而成,第二圈由9条弧线联结着9个大圆点。

这枚铜圆由江西铜元厂铸造。江西铜元厂建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铸造过“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大汉铜币”的图案设计,富有时代特点,充分展示了辛亥革命的性质。“赣”是江西省的简称。“辛亥”是干支纪年,即爆发革命的时间——公元1911年,摒弃了清朝的宣统年号。太极图,俗称阴阳鱼,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大汉铜币”四字明示对抗“大清银币”^②,与两个9圆点组成的圆圈(即“十八星旗”),共同充当辛亥革命的标志。



江西“大汉铜币”

孙中山1894年创建兴中会,在誓词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鞑虏”就是指满洲贵族的清王朝。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通过的革命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

字的革命宗旨,写进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准备起义时散发的《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又把它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孙中山解释“民族主义”的含义说,不能片面理解为“反满”,不是要灭满洲民族,而是“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③。宣传“反满”思想最激烈的章炳麟也说:“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④。可见,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就是“反清”,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江西的革命党人执行这个纲领,在所铸铜钱上写“大汉”,是表明与“大清”相对立,是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的宣示。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内地十八省除甘肃无留日学生外,17省都有代表参加,会后各省又都成立了支部。所以,铜钱上两个9圆点组成的图案,含意为18省大同盟,团结奋起反清,获得胜利。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客观评价“大汉”与十八圆点图案,应该指出这是“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意就是要将满族驱赶到东北满洲去,恢复清朝之前的明朝样子。当时会党中的“反清复明”口号也是这个意思。明朝境域大致相当于清朝十八行省的范围,没有包括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青海,不到当时中国领土的一半。所以,这句口号含有分裂国家领土的意味。^⑤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一贯反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学说,以为满汉早已融合,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而分裂必将遭到列强瓜分,直至亡国。^⑥

“十八星旗”起源于共进会。1907年东京同盟会的部分成员(其中有江西邓文翬)和哥老会、孝义会等会党首领,成立了“共进会”,制定了“十八星旗”:在大红底布上,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联合和铁血的革命精神。这“实为丙午年同盟会讨论国旗方式之一种。”^⑦确定采用这种图案,是狭隘“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具体结果。共进会组织传入国内,鄂、湘、赣、川都有它的分支。江西共进会成立于1909年10月,邓文翬任会长,负责联络洪江会、青帮等会党。湖北共进会与

新军中的革命团体合并,议决“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铃,更应早日制就,以备应用”^②。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插上黄鹤楼头。江西革命党人铸造的“大汉铜币”,是同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清末革命激进派的这种意识,有反清的积极性,然而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考虑,这种主张排斥了满、蒙、回、藏等民族,不利于民族大团结,倒是给民族分裂势力以口实,让帝国主义侵吞我国领土有可乘之机。孙中山后来把“驱逐”论修正为五族共和论,他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③五族共和的国策,产生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国家主权与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的效果,使国家转危为安。

江西革命党人中不乏“共进会”成员,既有九江军政府的“大汉光复”公告,使用18星军旗,也有南昌以“五族共和之五色旗”代替龙旗,指导思想不统一,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无疑是“种族革命”。^④这“种族革命”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概括,所以,铸造“大汉铜币”,既表示了对辛亥革命的忠诚,也是革命者存在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真实反映。由于它在流通领域的时间极短暂,1912年3月李烈钧接任都督之后,即被销毁,^⑤故其影响狭小。

货币,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反映了国家政权对财政经济的管辖统治权。这个权力是绝对的,不容例外,稍有侵犯,必以制裁。为此,在货币表面有多项文字,借以说明它的崇高权威,交换价值,使用原则,制造时间等等。从文化大范畴来看,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发挥交换效益的同时,又充当宣传的角色,它上面的文字和纹饰,无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信息,都是它所处的时代留给它的烙印。货币的信息广告作用是无声的,却是形象的,而且是掺入社会各个角落,为民众所接受。所以,辛亥革命中仅见的“大汉铜币”,将这次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熔铸上去,散发出浓烈的社会变革气

息,它印证历史的资料价值大大超出了钱币的财富价值,在我国铸币发展史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由于是采取钱币这种特殊媒介,将广泛渗入城乡市场,出入于小民手上,在无声之中进行宣传,效果不亚于口头言说与书面文告。

江西铜钱铸造业有悠久的发展传统,铸造“大汉铜币”,是江西铸钱工匠在中国钱币史上作出的新的重大贡献。作为稀见的历史文物与钱币,具有历史学与钱币学的研究价值,值得珍藏。

注:

①《陈炽集·庸书》外篇,卷下,《议院》。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页。

②《陈炽集·庸书》内篇,卷上,《学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页。

③《陈炽集·续富国策》自叙。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0页。

④详见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第670—67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辑《江西》。

⑥《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3。邵鸿主编《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第1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⑦《江西铁路百年图志》第一篇第二章,第15页。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年版。

⑧邹凌瀚等《呈请开办江西内河轮船公牍》。

⑨陈炽《续富国策》卷四,《商书·急修铁路说》。

⑩吴忠慈《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摘录《党史会党案·九江光复支队报告九江光复经过情形》。本文后面资料中的月日,大多依照原书写农历,没有换算为公历,请读者费神鉴别。

⑪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疏》,《退庐疏稿》,卷一。

⑫《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65。《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第1186页。

⑬《昭萍志略》卷七,《兵制》。

⑭《南昌(10月)29日电》。见吴宗慈《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

⑮见《辛亥革命》(三)《丙午萍醴起义记》,第478页。

⑯蔡复灵《同盟会江西支部史略》,见《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

⑰丁笏堂,名立中,新建县人,原为日知会会员,后隶共

进会,与孙武等在汉口新马路设大成印刷公司,为香港同盟会与武汉党人通讯之机关,香港来函均寄该公司,由丁笏堂转交金泉山。

⑮马当山炮台,在彭泽县北30里长江航线湾道处,水路极狭,有炮台5;湖口炮台,在鄱阳湖口下石钟山侧,东岸滨江有炮台1,西岸梅家洲滨江有炮台1,既扼江流要冲,且据江西全省水路之咽喉;金鸡坡炮台,在九江城东10里江南岸高阜上有炮台3;岳师门炮台,九江城东附近,有炮台2;田家镇炮台,湖北广济县(今武穴市)西南56里与南岸的半壁山隔江相望,有炮台3。

⑯吴照轩《辛亥九江起义纪实》,见《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

⑰龚士材《辛亥革命江西省会光复经过》,见《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作者时任江西总商会协理,南昌光复之际他时年40,在各方之间周旋奔走,亲历起事全过程,35年后他凭记忆写下这篇文章。

⑱此据龚士材所说,吴宗慈注:“按,罗家衡系任民政,蔡公时任交通,余人记忆不清”。

⑲《辛亥海军附记》,见《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

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开始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不久改称为“大清银行”,在天津的“造币总厂”铸造的银圆有“大清银币”四字。

㉑《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㉒章炳麟《排满平议》,《民报》第二十一号,第11页。

㉓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一文指出:“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

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使国家转危为安。”

㉔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第872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㉕《辛亥武昌首义记》吴忠慈注。见《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

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2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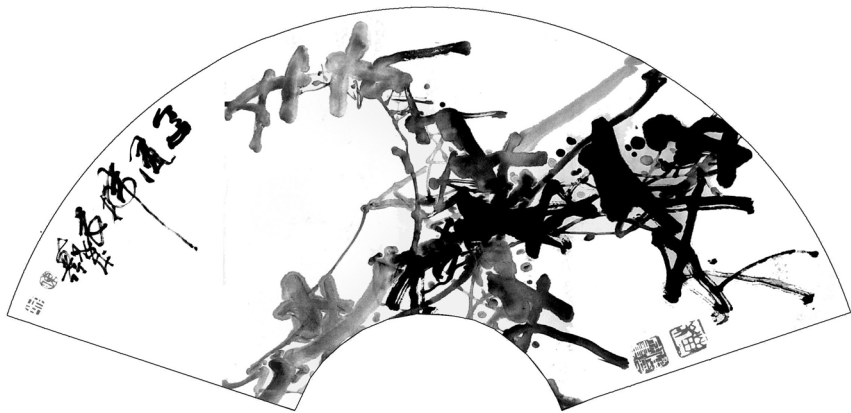
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㉘吴宗慈《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前言》,《江西通志稿》(未刊)第三册。

㉙据诸锦瀛《江西近代货币简史》,“大汉铜币”铸造于1911年11月30日马毓宝任江西都督之后,1912年3月8日马毓宝辞职,由李烈钧接任都督,“大汉铜币”被销毁,随后改铸“江西铜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按:本文由江西省文史研究馆报送中央文史研究馆,出席中央馆2011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于会上交流)

(作者: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西“溪(僊)狗”考辨

文◎邵 鸿

一、问题的提出

东晋南朝时期,江西的豫章、寻阳人士有被讥为“溪(僊)狗”的现象。古籍中有两个著名的典故:

《世说新语·容止》

“别日,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南史·胡谐之传》

“谐之,豫章南昌人。齐武帝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僊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谐之曰:‘卿家人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僊语。’帝大笑。”

“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患之,谓使曰:‘马非狗子,那可得以应无极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僊狗,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

多年以前,陈寅恪、周一良等先生据此认为,陶、胡二人皆为溪族,东晋南朝时江西多有溪族居住。

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谓:南方溪人,“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蜚渔蜚之比,散在南州诸境,其来源不可晓。”他着重以陶侃、胡谐之为例,证明寻阳、南昌有溪人居住,并进而推断,梁陈间南川土豪中的“新吴洞主”余孝顷亦为“江州之溪人”,“其地有溪人土著自极可能”。^①

周文得到陈寅恪先生的指点,故实际上反映了陈先生的意见。稍后陈先生在其《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据陶侃之早年曾事渔,贵族骂他为“溪狗”以及诸子狼勇好斗等,推断陶氏世为溪族并信仰为天师道。又据《南史·胡谐之传》

之载,称胡氏为“溪人”。^②此后他又在多篇文章和授课中反复申此观点,如在万绳楠先生根据他讲课笔记整理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说:“槃瓠蛮即僊或溪族,所以号为‘溪’,与五溪地名至有关系。陶侃少时以捕鱼为业,又出于溪族杂处的庐江郡,故于温峤‘溪狗’之谓,终不免有重大嫌疑。《晋书·陶侃传》谓陶侃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陶侃之家当是鄱阳郡内的少数民族。又陶侃既被当日胜流以小人见斥,而终用武功致位通显,他的儿子稟性凶暴的有不少。此则气类与溪族相近。”^③陈先生还更为肯定地认为,梁陈之际的黄法氾、熊昙朗、陈定、余孝顷、周续、周敷、周迪等诸多南川土豪,“若依《南史·胡谐之传》出生地域的关系言之,”“当与‘僊狗’同类”^④。依陈先生说,则几乎江西全境都遍布溪族,且其对东晋南朝历史影响甚大。

此说一出,历来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从之,如王仲荦、何兹全、万绳楠等先生的著作均如是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沿袭之,称陶渊明有蛮族血统。至今此说仍为许多人所遵从,比如最近出版的《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仍认为其时寻阳、南昌一带居住着溪族,溪族活跃于江西境内,^⑤而且大凡论陶渊明者,几乎无不肯定其先世为溪蛮,言之凿凿,几成定论。不过,也有学者曾怀疑这一说法,如吴之邨先生就批评其说“子虚乌有”,可惜未详细论证,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⑥

笔者认为,东晋南朝时期江西多有“溪(僊)人”之说虽为陈寅恪先生等大家所倡,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其又涉及作为后辈学人,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及其价值这样一个大问题,故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二、问题的讨论

首先,认为寻阳、南昌及整个江西地区有溪族居住,不符合六朝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形,

江西文史——
Jiangxi Wenshi

缺乏基本的史料支持。

为了说明这一点,自然要从“溪人”谈起。

中国古代北方有“奚”、“僊”一族,商代甲骨文中已见。其属东胡系统,北朝隋唐时期还一度强大,辽金时期逐渐湮灭^⑦。因与本文所论的南方“溪(僊)人”无关,这里暂可不谈。而中国古代的南方,则一直有一种被称为“谿子”或“溪(僊)子”的民族或人群。

《战国策·韩策一》:“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外。”这是说战国时韩国特产的弓弩中有“谿子”一种。《淮南子·俶真训》:“乌号之弓,谿子之弩,不能无弦而射”,高诱注:“谿子,为弩所出国名也。或曰:谿,蛮夷也。以柘桑为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阳,郑国善为弩匠,因以名也。”又《史记·苏秦列传》裴骃《集解》:“许慎云:南方谿子蛮夷,柘弩,皆善材。”《索隐》:“许慎注《淮南子》,以为南方蛮出柘弩及竹弓。”《太平御览》卷348引许慎注:“南方谿子蛮之弩,皆善射。”从这些注释中可以看出,汉代的人们,一般已把“谿子弩”视为南方一个蛮族的出产。这一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因为《战国策》说的很清楚,“谿子”系“韩出”,如果是南方进贡而来,则应为楚越之良而不可能为韩国所独擅。倒是高诱所说“一曰谿子阳,郑国善为弩匠,因以名也”才是正解,韩灭郑并都之,郑国所产当然就是韩国制造。但汉代以来注家的上述说法也有其依据和意义,这就是当时南方确有“谿(溪)子”蛮族,善制弩机,他们是在以今说古罢了。

“谿子”究竟是汉代以来的哪一民族,其分布地域何在,史料中并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魏书·司马睿传》在概述南方少数民族时,提及“巴、蜀、蛮、僚、谿、俚、楚、越”诸种,可见南北朝时期南方仍有“谿(溪)”族一支。《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干宝《晋记》:“武陵、长沙、庐江等郡之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据此云:“此支蛮种所以号为溪者,与五溪地名至有关系。”陈先生这一推测似有理,现时学术界一般也认为,溪族实即汉代以来著名的“武陵蛮”或“五溪蛮”,^⑧其中心聚居区是今湖南、

湖北、重庆、贵州接壤的广大地区。这里汉代设有武陵郡,境内有所谓“五溪”,《南史·夷貊传》:“荆、雍州蛮,槃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水经注·沅水注》:“武陵有五溪,谓楠溪、雄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皆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历汉、三国和整个南朝,除了蜀汉较为成功地对其拉拢加以利用外,“五溪蛮”一直是各有关政权的大患,战事不断。此后直到宋明时期,这里的少数民族仍被称为“五溪蛮”,也时有叛乱冲突见于史籍。

武陵蛮虽为诸蛮之一,但却为蛮族大宗所在。因为苗蛮(盘瓠蛮)的中心实在五溪区域,所以《后汉书·南蛮传》开篇叙述盘瓠及盘瓠蛮事后总括一句:“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干宝《晋记》把武陵、长沙、庐江之蛮统称为“杂处五溪之内”,放大了“五溪”的范围,其说虽错,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即长沙、庐江盘瓠诸蛮总体上出自武陵。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还不能否定武陵蛮以外的盘瓠诸蛮也有可能被称之为“溪”。

《南齐书·蛮传》:“蛮,种类繁多,语言不一,咸依山谷,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此蛮族之大致分布范围。因此就总的分布情况来说,江西并非蛮族的聚居区域,即使把所谓“谿(溪)”扩大到整个蛮族的话,其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不太扯得上关系。唯一和江西有关系的,当属江州的“庐江蛮”,因为从地理上说,寻阳在西晋时期还属于庐江郡,但寻阳其实也并不是蛮区(详下)。

史料中还有少量“溪人”分布的具体记载。《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这是东晋时粤北韶关地区有溪人聚居的明证。又《太平御览》卷963引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沙麻竹,人削以为弓,弓似弩,《淮南》所谓溪子弩也。”又引《岭表录异》:“沙麻竹,广、桂皆植;”引裴渊《广州记》:“石麻竹劲利,削为刀,切象皮如截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岭表有竹,俗谓司马竹,又谓私麻竹,《南越志》曰河麻竹,可为弓,似弩,谓之溪子弩。”将这些记载和前面汉晋注家对“谿子”弩解释对看,则“谿子”所处,确